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办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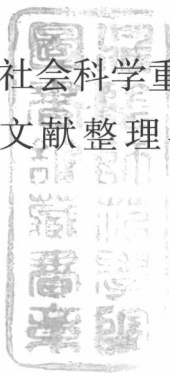
牛继清 主编

◆ 黄山书社

1408585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办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四卷

牛继清 主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08585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4卷/牛继清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11. 4

ISBN 978-7-5461-1748-5

I. 安… II. 牛… III. ①地方文献—研究—安徽省—丛刊
IV. ①Z12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873 号

本书得到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资助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四卷) 牛继清 主编

出 版 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周振华 周 红

责任印刷:李 磊

装帧设计:亚施照排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 press - 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 hsbook. cn/index. asp](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551-2673012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23 字数:450 千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1-1748-5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叶 华

副主任:牛继清

委 员:王 政 牛继清 叶 华 纪健生
李 勇 余敏辉

主 编:牛继清

副主编:纪健生

编 辑:赵 敏

目 录

文献学研究

- 《郡斋读书志》版本源流
- 兼论“宋淳祐袁州刊本”的真伪 牛继清 (1)
- 浅析章学诚知“类”的治学思维特点 杨 乐 (15)
- 章学诚“志乃史体”观的逐步完善
- 从安徽两志与《湖北通志》比较入手 王嘉炜 (27)
- 朱睦㮮与《经序录》 曹金发 (34)

历史文献研究

- 从《史记》述“天”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王振红 严凤成 (40)
- 姚碧《荒政辑要》的史学价值 刘亚中 (52)

文学文献研究

- 清代皖人女性诗词选本的价值 乔 琛 (75)
- 胡承珙的笺《诗》立场论略 陈 才 (81)

皖籍学者研究

- 理学与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 张丽丽 (96)
- 吴应箕的经世致用思想 赵冲冲 (111)
- 学博行古 上彻天听
- 知不足斋主鲍廷博评传 周生杰 (127)
- 赵绍祖的金石证史 马小丽 (144)
- 征信以托不朽
- 略论包世臣的传记文创作 刘佰合 (171)
- 论夏燮的史学素养 马德权 (180)

- 许承尧学术传略 梁 芬(190)
胡朴安的文献观念与文献研究方法 朱 敬(200)
丁山先生学术评传 雒有仓(214)

安徽女作家研究

- 《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跋 纪健生(231)
《安徽名媛诗词征略》所录徽州女诗人补正 邱瑰华(243)
《清诗纪事·列女传》补正十则 傅 瑛(253)
才名久遍大江南
——许燕珍其人其诗 郭全芝(259)
《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补遗 邵菊花(268)

年谱研究

-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收朱熹年谱补正 盛 菊(281)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

- 试论嵇康的琴德观
——以《琴赋》为中心 陈聪发(285)
李绅诗歌用韵初探 孙园园(289)
明代桐城理学文化述论 李 波(302)
清代黄淮平原东部流民的规模与流向略论 王开队 颜培华(318)
《两宋徽籍诗人考》补遗 朱少山(328)
论乾嘉学者的文献整理精神 王智汪(337)

书 评

- 一树红梅映粉墙
——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 鲍 恒 王延鹏(342)

资 料

- 清代皖人目录提要 来新夏(348)
魏心一同志与安徽古籍整理出版 诸伟奇(360)

文献学研究

《郡斋读书志》版本源流

——兼论“宋淳祐袁州刊本”的真伪

牛继清

《郡斋读书志》，南宋晁公武撰，今常见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宋淳祐袁州刊本”，均属袁本系统。其书七卷，前四卷为晁公武所撰，后志二卷为南宋赵希弁据“衢州本”补，附志一卷及考异为赵希弁撰。或以考异别为一卷，则八卷。

《郡斋读书志》初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此后晁公武又有所增补。自南宋理宗淳祐（1241—1252）末大量刊行传世以后，就形成了二十卷的“衢州本”和以四卷本为核心的“袁州本”两大版本系统。由于其后刊刻和流传过程复杂曲折，后世尤其是清代学者在著录和进行版本研究时不够全面深入，所以相关论著的著录与说明比较混乱，甚至有矛盾的地方。而《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三编等影印的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也有很多疑点，极可能是明万历间（1573—1620）的重刻本。本文拟就以上相关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祈请方家教正。

一 《郡斋读书志》版本源流*

晁公武(约1105—1180),宋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人,字子止,世居汴梁昭德坊,人称昭德先生。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初为四川总领财赋司干办公事,此后长期在四川任职,先后通判潼川府,知恭州、荣州,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四川安抚制置使等,受前后上司井度、郑刚中、赵不弃、虞允文等的赏识和荐举。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后,历知兴元府、扬州、潭州,终敷文殿直学士、临安府少尹,乾道九年罢。事迹散见于《宋史》纪、志、传及《四川通志》、《临安志》、《舆地纪胜》等志书。一生著述宏富,仅见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就有《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毛诗诂训传》二十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诂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老子通述》二卷以及二十卷和四卷的两种《郡斋读书志》,博涉四部^①。

《郡斋读书志》是现存我国最早的私家目录著作,是考察南宋典籍收藏与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下面结合刊刻时间和版本系统,梳理南宋到清末《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如下:

1. 原刻四卷本《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是晁公武根据南阳井度的藏书撰成的。井度也长期任职巴蜀,酷嗜典籍,长期搜罗转录,所获甚富,还曾组织校刻“眉山七史”,暮年以其子孙“稚弱不能自立”,将藏书转贻晁公武,晁氏在《郡斋读书志自序》中详述了其中原委。

晁公武知荣州(今四川荣县)期间,在政事之余,对井度旧藏精心校勘并撰定了提要,“日夕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②。完成了《郡

* 有关《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问题,近年来陆续有研究者注意并有文章发表,如王晓鸣《浅谈〈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及解题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1.4)等,但都未能细致清楚地描述出衢、袁两系统版本的历史,甚至未能达到清代学者的认识水平,又两文相关部分雷同,似出一源。

① 《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清人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衢本郡斋读书志跋》对晁公武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考定。

②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本。

斋读书志》四卷,涉及书籍皆为井氏旧藏。今传衢本“原序”署有“绍兴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为袁本系统所无,序之文字亦稍有不同。从袁本系统的“凡得书若干部,计若干卷”,到衢本的“书凡五十篋,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修订痕迹明显,应该是晁公武在对初刻本进行增补后对“原序”所做的修订。但是,王应麟《玉海·艺文》著录四卷本《郡斋读书志》云:

晁公武《读书志》四卷,初南阳井氏度传录蜀中书甚富,举以与公武。公武分为四部,经类十,史类十三,子类十六,集类三。每读一书,撮其大旨论之。绍兴二十一年自序。^①

王氏在宋末元初,其所叙自序年份又与衢本同,应该可信,其所著录的可能是原刻四卷本。世传袁本自序并无年份,是很不正常的,那么,世传袁本究系赵氏初刻时去掉年份,还是后来翻刻时漏落了年份,尚不可知。此外,四卷本有晁氏“门人”茂州通判杜鹏举“序”,谓“作邑峨眉下,望先生沧洲之居鸡犬相闻”,衢本游钧“序”又云晁公武侨居“嘉定之峨眉”,因此,四卷本《郡斋读书志》的初刻年代应当在绍兴二十一年,刊刻地点在嘉定(今四川乐山)。

原刻四卷本《郡斋读书志》现已不存,从出自这一系统的《四库全书》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的情况看,四卷分别著录经、史、子、集四部,前三卷又分为上、下。卷一上自“易类”至“乐类”,卷一下自“春秋类”至“小学类”;卷二上自“正史类”至“杂史类”,卷二下自“伪史类”至“书目类”;卷三上自“儒家类”到“农家类”,卷三下自“小说类”至“释书类”;卷四为别集,由于数量较多,分为上、中、下三卷。有晁公武“原序”和杜鹏举“序”。

南宋理宗淳祐己酉(1245年),赵希弁在原刻四卷本基础上增补成五卷本。黎安朝在“序”中说,赵希弁“益为五卷,别以《读书附志》并侵诸梓,俾得托晁氏而并传”,第二年他在跋《后志》时又称“昭德先生《三荣郡斋读书志》四卷既刊传矣”,则淳祐己酉的这次刊刻,四卷本和增补的五卷“袁州本”是并行的,因之此后四卷本仍然流传,《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有“晁公武《读书志》四卷”;明代,四卷本仍有刊刻的迹象,并配以赵希弁所续部分的单刻本,焦竑《国史经籍志》即著录作:“晁公武《读书志》四卷,《续读书志》四卷。”清初倪灿《宋史艺文志补》,是在与修《明史·艺文志》时所撰,史部目录

① (宋)王应麟:《玉海·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类补有“赵希弁《续读书志》四卷”，依据可能就是焦竑《国史经籍志》，因为此后未见有四卷本《读书志》及赵编《续读书志》四卷的著录。

2. 蜀本和衢州本《郡斋读书志》

根据衢本晁公武“原序”，四卷本当是晁氏完全据井氏贻赠之书撰成。绍兴二十一年四卷本刊刻后，晁氏又对自家所藏与井氏书不重复者继续校勘并撰写提要，对《郡斋读书志》进行修订。修订本后来由其门人姚应绩编成，析分为二十卷，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和原刻本有了很大的差别，即后来衢本的祖本“蜀本”，又称“姚本”。衢本游钧“序”则云：“昭德晁公侍郎侨居蜀嘉定之峨眉，平生著书有易、诗、书、春秋《解考》，其异同甚详，又作《读书志》，皆殫版。大父及严君喜藏书，在嘉定时尝摹而藏之。”这说明游钧的先人在嘉定所得二十卷本并非刊本，而是摹写本。那么，“蜀本”如果有刊本，也可能是在晁公武身后的孝宗淳熙（1174—1189）间，至早也在晁氏离开四川也就是乾道六年（1170年）以后。

淳祐己酉五月，知衢州南充人游钧按其父祖所摹“蜀本”，刊刻《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并序，是为衢本。南宋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史部目录类著录“晁氏《读书志》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二十卷”，当即此本。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就主要是依据衢本《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撰成，并于目录类著录“晁氏《读书志》二十卷”。但有明一代，各家目录均未见有二十卷本《郡斋读书志》的著录。

清初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有宋晁公武《昭德先生读书志》二十卷抄本两部，均装为五本。传是楼藏书后来经何焯介绍，转让给了怡亲王府。不过也有人说“传是楼书大半归于明珠，而其家人安麓村所藏者亦多善本”^①，徐氏因党同明珠为当世所讥，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又曾从徐氏学，徐乾学所编《传是楼经解》也由纳兰性德刊刻为《通志堂经解》，此说可能并非空穴之风。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明珠之死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何焯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允祥封怡亲王则是同年雍正即位之后。那么，传是楼藏书的分散可能是在1694—1708年间。此后近一个世纪，并无衢本在社会上流传的记载，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其所著录的《郡斋读书志》乃“袁州本”系统，因此四库馆臣在撰定提要时慨叹：“不特衢本不可复见，即袁本亦非旧文。”^②

① 钮树玉：《钮璽石日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乾隆(1736—1795)末,瞿中溶得到了一部不全的手抄本《郡斋读书志》,使得失踪百年的衢本重现于世,引起了当时学界的普遍关注。瞿氏将其与袁本做了对照,写成了《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辨》,论两本优劣,认为衢本所收书比袁本“多几及倍”。钱大昕也说:“马氏《经籍考》所引晁说,皆据衢本,不用袁本,当时两本并行,而优劣自判。今世是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抄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①此后学者如顾广圻、李富孙等都特别关注“新出”之衢本,袁本研究相对冷落,只有鲁山张宗泰给予袁本以较多关注。嘉庆丁卯(1807年),阮元以所得《四库》未收书一百五十余种奉进,即“宛委别藏”,并撰有《四库未收书提要》,其中有衢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不过仅云“从旧抄依样影写”^②,不明来历。

嘉庆己卯(1819年),吴县汪士钟(阆原)购得旧“抄白衢本”《读书志》,属著名版本校勘家黄丕烈(尧圃)、李富孙(芑沚)为之校订,刊刻成书,有尧圃序,芑沚及阆原跋,是为汪氏艺芸书舍刊本。顾广圻说黄丕烈从瞿氏借得原抄本,后由汪士钟付梓,则汪氏刊刻时所据之本应该就是购得的瞿氏藏原抄本。李富孙刻本跋云曾以顾氏所抄副本校之,但顾氏自己说,自己的抄本一直“藏诸篋中,未尝示人”,同时指出了原抄本错简,黄、李未能校正之例,则黄、李并无以顾抄副本相校之事^③。

嘉庆间卢文昭曾校定过抄衢本《读书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载:“余曾见卢抱经手校之三衢写本,诧为秘册。”^④道光(1821—1850)以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史部目录著录有钱曾(遵王)抄本“衢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十七史部目录类著录有抄本“衢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二十卷”。

晚清时期,又接连出现了两种衢本系统的《郡斋读书志》刊本。光绪庚辰(1880年),会稽章寿康重刊衢州二十卷本,卷首一卷,是其一;光绪甲申(1884年),王先谦得到瞿抄本,即以衢本系统的汪刻本、缪荃孙(筱珊)藏手抄本并陈刻袁本合校,并参考了瞿中溶《考辨》,附以袁本赵希弁《附志》二卷,由长沙思贤精舍刊刻,王氏并郭嵩焘作序,后附“校补”与“晁公武事略”,学者称其版本精善,但又讥其失却原貌。

①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附《四库未收书提要》。

③ (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四《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辨跋》,道光己酉十月上海徐氏刊本。

④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目录类一》,《续修四库全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民国十年刻吴兴丛书本影印。

3. 袁州本《郡斋读书志》

南宋理宗淳祐己酉,知袁州(今江西宜春)黎安朝以所得蜀原刊四卷本《郡斋读书志》令赵希弁校正。赵氏藏书亦富,乃以家藏补其未载,成附志一卷(上、下),补充书目五百余种,黎安朝为序并刊于郡斋,即最早的“袁州刊本”。如上文所论,此次刊行,四卷本与赵氏增补的五卷本当是并行的,这也是后来四卷本依然流行的直接原因。

第二年,赵希弁又从同州蔡廉父处得到了上年游钧所刊衢州本,将其与原四卷本及袁州己酉刻本进行了仔细的对照。“摘取其所增入者,凡四百三十五部,总八千二百四十五卷,往往皆晁氏之书,请于郡而并刊焉。然四卷既传矣,不敢以《附志》次其先,自为《读书后志》二卷。”“至若二本所载并氏四卷之书,其间有实同而名异,此备而彼遗,与夫分种入类之各不同,又为考异于编末。”^①这就是袁州第二次刊本,共七卷,比己酉刻本多出《后志》二卷及考异,赵希弁自序,黎安朝跋,并附入了衢本晁氏原序及游钧序。著录时,但凡衢州本多出但《附志》已有之书不再录入《后志》。

因此,黎安朝和赵希弁在袁州整理并刊刻的《郡斋读书志》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四卷本、五卷本和七卷本,其中四卷本与五卷本初刊于己酉,七卷本初刊于庚戌(1246年)。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后文我们依次称它们为袁本Ⅰ、袁本Ⅱ和袁本Ⅲ。

王应麟《玉海》、《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有袁本Ⅰ。焦竑《国史·经籍志》亦著录袁本Ⅰ,并有《续读书志》四卷,倪灿《宋史艺文志补》据之补“赵希弁《续读书志》四卷”,《续读书志》应当是明人将赵希弁对袁本Ⅰ的增补分离出来单独刊刻所成。元明两代,未见有关于袁本Ⅱ和袁本Ⅲ的著录。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抄本《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附志一卷考异一卷,属袁本系统的抄本,计十四册,有何焯批校,张敦仁跋,顾广圻题款。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海宁陈师曾根据旧抄本翻刻了袁本Ⅲ,即“陈刻小字本”,成了清代袁州本系统的通行本,所以嘉庆初钱大昕说“今世是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不过清代流行的袁州本系统的各种版本已经存在突出的问题,《四库全书》收录的《郡斋读书志》为两江总督采进的袁本Ⅲ,我们且称之为“四库校抄本”,通过对该本的校考,四库馆臣在所撰该书“提要”中指出:“疑此书已经后人删削……即袁本亦非尽旧文。”道光庚寅(1830年),晁奭端据袁本Ⅲ刊刻《郡斋读书志》,即“晁刻本”。

① (宋)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本。

二 清代以来学者对《郡斋读书志》认识的问题

清代以来,学者比较重视《郡斋读书志》的著录、说明与研究,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在该书版本源流的一些关键环节上,仍然存在一些误解甚或混乱的说法,有必要澄清。

1. 袁本的定义及刊刻时间

最早称袁州刊本为袁本的无疑是赵希弁本人,他在七卷本“考异”中对照两本差异,即称袁本如何,衢本又如何。这里的袁本,显然是指袁州刊四卷本,即上文袁本Ⅰ,所以,清代学者钱大昕即云“袁州本仅四卷”。从现存元明两代著录情况看,袁本Ⅰ一直比较流行,而赵希弁所补部分另以《续读书志》的名义单行。不过,清代以后社会上流行的袁州本系统的《郡斋读书志》则主要是七卷本,即袁本Ⅲ,钱大昕所言“马氏《经籍考》所引晁说,皆据衢本,不用袁本”,“今世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四库总目提要》“袁本亦非尽旧文”等,都是指袁本Ⅲ,不可混而谈之。

清代以来学者凡谈袁本,均据《后志》赵希弁序和黎安朝跋定其刊刻于“淳祐庚戌”,实际上如前所论,袁本Ⅰ、袁本Ⅱ的刊刻时间在淳祐己酉,只有袁本Ⅲ的刊刻是在淳祐庚戌,不可一概而论。而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跋》中云“淳祐己庚两刻出板”,也是统衢、袁二本而言,并非单指袁本。

2. 衢本、袁本优劣的争论

衢本在清初尚有抄本传世,如徐氏传是楼即藏有两个抄本,但并未引起学者的特别重视。而自清初至乾隆末,社会上流传的《郡斋读书志》主要是袁本系统,尤其是康熙陈刻小字本,《四库全书》著录时也是以袁本为祖本的,所以钱大昕有“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的说法。嘉庆初瞿中溶得到一部不全的“抄白衢本”,立即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的目光。此后,钱大昕、顾广圻、黄丕烈、李富孙、卢文弨、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均对衢本进行了考校和研究,并就衢、袁两本优劣发表了意见。总的来看偏向于肯定衢本,而对袁本则颇有微辞,认为是不全初稿。其主要理由是“所收书则衢本几倍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用衢本不用袁本,以及当时流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但“袁本非尽旧文”三点。其实,乾嘉时代学者重目录版本之学,又对新出稿本抄本非常

敏感,因此群起研究衢本,相应冷落袁本是当时学风所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进入民国,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发现后,傅增湘、张元济等人倡为影印,有利学术,功不可没。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撰写长跋,“为袁本怀不平”,历举衢、袁两本区别。通过统计,得出了“袁衢相抵,袁多于衢者且七,更未尝有衢本多几及倍之事也”。祖述赵希弁之疑,认为:“姚编序且伪托,其书真贋难定。”“马氏未见袁本。”“袁本舛驳焚乱之名且可移赠衢本矣!”最后的结论是“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①。其论证虽有一定道理,但意气用事的色调也是显而易见的。

姚应绩编二十卷本《读书志》,所收书比四卷本多出四百余部,因此清代学者肯定其为晁氏“晚年续袁之书”。但赵希弁在“后志自序”中揭示,衢本“自序”中“合吾家旧藏,得若干卷”与四卷本“序”中所言“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然自中原无事时有火厄,兵戈之后,尺素不存”有明显牴牾,质疑二十卷本“或者先生续笔邪?抑门人推广其遗志也?”得到了张元济的支持,而这一点也正是衢、袁优劣的关键问题。如上所论,四卷本《读书志》编成刊刻在绍兴二十一年,姚编本则极可能是晁氏身后编成,至早也是晁公武离开四川之后,即乾道五年之后。从绍兴二十一年到乾道五年的二十年间,晁氏一直在四川任职,在此期间,他搜罗图书并对四卷本《读书志》做一定的增补是很自然的。虽然四卷本“自序”云“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但衢本《麟台故事》条下,晁氏又说“予所藏书,断自南渡之前,独此书以载官制后事为详,故录之”。可见“尺素不存”是夸张的说法。而晁公武很为井度“以俸之半传录”图书的精神感动,他自己半生在“人间多有异本”的巴蜀任职,不会不搜集传录一些珍贵典籍。同时,衢本多出四卷本的著录中,有相当部分是晁氏家族先人的各类著作,衢本《道院别集》条下晁公武备述自己传录这些著作的艰辛,其搜集图书的活动可见一斑。因此姚编本“自序”“合吾家旧藏”与“尺素不存”并无矛盾,姚编应该是晁氏所增补的定本,言其“伪托”有过分之嫌。

至于袁本,《附志》著录全属赵氏藏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孝宗、光宗以后新出著作,是晁氏根本无法见到的,有些书,如王伯大《秋浦新志》十六卷的著作时代甚至晚到宋理宗端平(1234—1236)间,稍早于淳祐,从南宋典籍著录的角度来说是对《读书志》的重要补充。可是即使如此,赵氏还是从衢本中抽绎出了四卷本及《附志》未及之书四百余部,而且赵希弁还是在对姚编持怀疑态

^①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跋”。

度的同时编刊《后志》的,这本身就说明了衢本对袁本的优势及其价值所在。所以“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亦属过激之辞。衢、袁两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两本共存互补,才是学术幸事。

3. 对于“袁本”的一点怀疑

今传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及其他袁州本系统的刻、抄本,除晁公武袁州本“自序”外,所有序、跋都署有年份,只有晁氏袁本“自序”是个例外,这本身就令人很难理解。而衢州本晁公武自序署“绍兴二十一年”,两者间的差别又可能造成衢本系统的二十卷本为晁氏改定于绍兴二十一年的误解。可是历来研究《郡斋读书志》版本的学者都忽略了南宋末王应麟《玉海》的记载:“晁公武《读书志》四卷……绍兴二十一年自序。”王应麟生存时间较早,所见四卷本要么是原刻四卷本,要么是袁本Ⅰ,晁氏“自序”下署“绍兴二十一年”,则四卷本是该年编成的,这一时间与晁氏的仕历大致相当,应该可信,这样一来“袁本”系统的自序真伪就值得怀疑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姑且不论字句的差异,单就时间的刊落来说,如若王氏所见是原刻本,赵希弁刊落自序时间可能会是无意的疏漏;如果王氏所见是袁本Ⅰ,那么时间刊落就会是在袁本Ⅲ刊刻时,也就是他已经见到衢本以后,那么问题就相当严重,赵希弁应当是为了维护袁本的价值而有意刊落年份,并有可能改动“自序”的文本。因此讨论《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比较袁、衢两本的优劣都不能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

三 关于“宋淳祐袁州刊本”的真伪

民国十六年(1927年),清宫事务善后委员会主张影印故宫所藏善本古籍,著名版本学家傅增湘力主率先印行经鉴定是南宋淳祐袁州刊本、“恐系世间孤本”的《郡斋读书志》。其时张元济在上海以原涵芬楼所藏宋元善本书为基础,编辑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丛书;七月,傅致信张元济,建议商务印书馆与清宫善后委员会合办此事,并期望“将来拟印大部丛书”,同时将《郡斋读书志》的“尺寸叶数寄上”,催促张氏“速复”^①。此后,傅、张双方就该书影印事宜多次书信商讨。不久,傅氏就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最

^①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65—19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终促成了包括《读书志》在内的故宫善本的影印出版。1933年《续古逸丛书》、1935年《四部丛刊》三编先后收入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该书后来到了台湾,1978年台湾成文再次影印出版。

关于“宋淳祐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的情况,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有载:

《昭德先生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宋晁公武撰,附志一卷考异一卷,宋赵希弁撰。

宋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人姓名,版式甚宽大。前附衢本原序及二十卷目录,次杜鹏举序,次淳祐己酉日南至宜春假守番禺黎安朝序,后志附二本考异,次淳祐庚戌黎安朝跋,次淳祐己酉夏五郡守南充游钧跋。附墨记二行,文曰:书表司刘瑜等楷书,刊字匠黄应等刊板。……

按:此亦故宫博物院之书,天禄琳琅所未收也。

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人姓名等,都是宋版书的重要特征,可见傅氏当时主要是从版式角度将其鉴定为宋刊本的。但我们现在细检其书,发现其中有很多疑点,该书是否“宋刊本”应重新认识。

其一,版本来历问题。

清代汉学鼎盛,学者崇尚目录版本之学,对于旧刊、抄本特别是宋元刊、抄本趋之若鹜,无不争相收藏、传抄、著录、考辨,而官、私修各种丛书,更是以辑录善本为首务。如上文讨论《郡斋读书志》版本源流时所论,元、明、清三代现存各种重要目录学著作,均未见著录有八卷本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即袁本Ⅲ,亦未见清代学者论及。

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出自故宫,但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馆臣未见其书,或并不认为是宋本,在之其所收《郡斋读书志》是根据后出的翻刻本,并在提要中强调“疑此书已经后人删削……即袁本亦非尽旧文”。《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乃乾隆九年编大内所藏秘籍而成,乾隆四十年经补辑定稿,嘉庆初,彭元瑞等又撰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两部内廷书目均不收该书,这与清代学者重视版本的风尚是极不一致的。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一状况,要么该书进入内廷甚晚,要么书目编撰者亦不认为其是宋刊本。

总之,从历代尤其是清人收藏与著录的情况来看,此书来历不明,不可轻信。

其二,避讳的问题。

宋人避讳最严,至避嫌名,因之,讳例向来是鉴别宋版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南宋于淳熙(1174—1189)、绍熙(1190—1194)两次重修文书式,详定讳例,诸帝旧讳外仍及嫌名,并明确“正字皆避之”。一直到理宗绍定(1228—1233)间所修《绍定礼部韵略》,卷首仍先载淳熙、绍熙重修文书式,陈垣叹为“空前绝后之例”^①。

今检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于两宋诸帝旧讳及嫌名,有避有不避。如“玄”字有些地方缺末笔避,但仍有很多地方并不避,自卷一至“后志”皆有作“玄”、“炫”、“絃”等的,“朗”字亦有避有不避。又于太祖之父讳“弘”字、仁宗嫌名“贞”字、神宗嫌名“勛”、孝宗旧讳“瑗”均有避有不避。不避太祖曾祖之讳“廷”、“庭”,祖父之讳“敬”、“镜”,太宗嫌名“耿”,英宗嫌名“署”、“暑”,神宗本名“顒”字,哲宗嫌名“晌”,钦宗旧讳“桓”、嫌名“院”,高宗嫌名“勾”、“觐”,宁宗嫌名“郭”等字。甚至于当朝理宗皇帝嫌名“筠”字也是有避有不避。这种避讳中的混乱现象,显然是出自重刻过程中刻工的失误,有些地方注意到了,另外的地方则疏忽了。因之早在清末,叶德辉就强调“重刻宋本,多存旧讳,则以纸墨定之”^②。

其三,刻工的问题。

某时代有一时代的刻工群体,这也是版本鉴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宋淳祐袁州刊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末载书手与刻工作“书表司刘瑜等楷书,刊字匠黄应等刊板”。另外,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可以检出的刻工姓名完整的有黄应、黄明道、黄大寿、罗应、章大庆、张大雅、陆逸、文友、文质、文贤等十人,而这十个人,概不见于其他宋版书刻工名录。十人外尚有单字何、辛、余、禹四字,应该是刻工之姓氏。

检视其他时代的版刻,我们发现,明万历金学曾景贤堂初刻,明崇祯、清康熙递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刻工中有名叫黄应的,刊刻时间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③。值得注意的还有,该书刻工中有三名黄姓刻工,徽州黄姓刻工大批量活跃是在明朝嘉靖、万历(1522—1620)间,南宋末,黄姓刻工尚不多见。

禹姓刻工极少见,披检明万历沈大忠时习轩刻本《洪武正韵高唐王篆

① 参见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1997年版。

② (清)叶德辉:《藏书十约》,《郎园全书》本,长沙叶氏观古堂1935年。

③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5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